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是深刻的『第二个结合』

□ 王学斌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是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概念。物理反应指物质的状态发生了改变，而物质本身的性质没有变化；化学反应指分子破裂成原子，原子重新排列组合生成新物质的过程。判断一个反应是物理反应还是化学反应的依据是反应是否生成新的物质。习近平总书
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比喻为“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简单易懂又含义深邃，强调“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必然意味着结合的两大主体在极为深刻的创造与结合中取长补短、实现超越。这种意义上的“结合”不能是简单数量叠加的“物理反应”，而是经过一次次碰撞、互动、会通而实现螺旋式上升后的血肉相连、水乳交融，乃至基因重组，这实际上属于极为复杂而深入的“化学反应”，否则不能称之为“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深刻把握和实现“化学反应”，大致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要深谙产生“化学反应”的具体条件。回顾人类文明史，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另一个文明体内获得较快发展，与既有本土文化互相融通，必然具备如下因素：第一，该文化自身必须是一种优质文化，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与对话能力；第二，与外来文化相接触的本土文化亟待更新和转型，且只靠内在力量短期无法实现自我更新；第三，该外来文化介入的方式，绝非替代或消灭本土文化，而是采取融合的模式，在保存本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和宝贵元素的同时，实现深层次和高层次的本土化转换。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外来文化的民族化转换是一个同时发生、相向而行的同步过程。具体到“第二个结合”，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其次，要明确“化学反应”的实质过程。“第二个结合”既然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它必然要经历一个极为繁复多变的历程，但并非无规律可循。按照文明交融的一般情形，本土化往往是外来文化于异质文化氛围中经过长时段全局性的融通、结合以至同化后重新获得一种带有深刻本土烙印的新形态。比如来自古印度的佛学，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长达近千年的融合后，化入中华文明的肌体之内。如今在中国人口中或笔下时常出现的诸如“真理”“报应”“孽障”等词汇，都是源自于佛典，可见已达到日用而不觉的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亦复如此，其通过层层深入融合，最终渐入佳境，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展开讲，主要包括四个层次：先是载体的中国化，即通过传媒、书籍、物质与人的传播和发展；接着是符号的中国化，即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经过了解中华文明的学者的翻译与解说，形成便于国人理解的版本；再次是阐释的中国化，即本土的学者使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符合中国思维方式、现实需求和文化习惯的解释与研究；最后是实践的“中国化”，即运用已经初步或达到某种程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所遭遇的实际问题，并在具体实践中越使用越结合，持续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形成了丰富系统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

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惟其如此，“第二个结合”这一“化学反应”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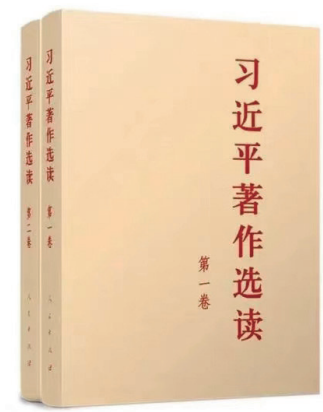
习近平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经典篇章

——读习近平总书记《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 刘文郡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是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阐明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所系、担当所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并提出了“七个着力”的重大任务，与这篇文献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些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经典篇章，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规律的认识提到新高度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概括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这一概括把我们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规律的认识提到新高度，明确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任务书。

举旗帜——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这面旗帜凝聚着中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理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是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发展前景的旗帜，是指引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胜利的旗帜。

聚民心——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聚民心”就是要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认同上，“聚民心”这一目标把舆论导向与团结人心紧密结合，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育新人——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育新人”这一鲜明论述，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时代新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兴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篇重要文献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资源纳入视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开放性。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明确了工作着力点，为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作出重要指引。

展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一些西方国家炮制“中国威胁论”等来贬损中国形象，企图遏制中国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进行斗争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

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各级党委（党组）的责任；重拳整治网络生态乱象，建立中央、省、市、三级网信管理工作体系；制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有力指导和支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得到充分贯彻，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重读这篇经典文献，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开展工作，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在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中感受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

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队伍建设。要落实政治责任，勇于改革创新，强化法治保障，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优秀工作队伍是实现使命任务的关键所在，要不断增强工作能力本领，提高工作质量效能，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通过价值理念引领社会风尚，培养时代新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把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而其中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坚定“四个自信”，深入研究、大力宣传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伟大成就、优良传统、宝贵经验，从而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把课堂搬到社会实践中去

——政治经济学家马哲民的治学之道

□ 向华丽 李顺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的自勉，也是自号“铁肩”的马哲民一生奋斗的真实写照。他毕生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著名的“红色教授”和革命青年的“指路人”。

未曾停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步伐。马哲民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但社会依然内忧外患，军阀割据、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中国向何处去？大批仁人志士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民族运动中，探寻改造社会的出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马哲民开始向往俄国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投身“五四运动”的时代洪流。马哲民回忆：“我就不得不注意开辟新路，也就是要把目光投向革命方面。”

1920年至1927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社会状况和国际局势的激烈变化让人始料未及。马哲民作为立志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进步青年，从最初的反封建，趋向民主主义，再转向社会主义，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一阶段的革命实践，加深了马哲民对中国

社会的认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马哲民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一生未曾停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步伐。他在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知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其《社会经济概论》《精神科学概论》《经济史》《新社会学》和《社会进化史》等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论著都是从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迁的规律。除此以外，还有“‘政治’、‘法律的生活’过程之研究”即《政治科学概论》和“‘物质生产’过程之研究”即《经济科学概论》，分别从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上层建筑生产等方面体系化地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重学术本土化思考。马哲民在《〈中国经济学〉导言》中谈道：“过去在中国经济学之创造方面，比较有意义的工作，一为中国经济性质之研

究，一为中国经济史之研究，因必在此两方面得有收获，方能将中国经济生活之理解，奠定基础，然后才能更进一步的研究，把握中国经济生活之具体的法则，以创建一种完全合于实际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他始终坚持把学术研究的关注点放在解决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上。

1928年至1929年，他审视和研究国内外局势，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英法海军协定与世界和平》《战后欧美经济概况及其新趋势》《印度民族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前途》等，以他国的经济概况、民族运动历史、资本集中化的发展来观照中国其时的现状，颇有他山之石的深意。1929年，马哲民到暨南大学社会系任教。他埋首书斋，潜心研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写文章和著书上，陆续出版了《国际帝国主义史论》《经济史》《社会进化史》《社会经济概论》等多部专著。这些著作使得马哲民成为在应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开展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近代经济史学科的

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他根据社会现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经济政策、工业研究、农村问题以及战时经济的政论文章，如《抗战中的经济政策》《抗战与民权及民生》等。这些著作凝聚着马哲民对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充分彰显了他研究社会经济、关注民生民权的情怀，也奠定了他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要地位。

把握理论指导与业务钻研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哲民一生与教育事业相连。早在抗战时期，他就积极向学生和军政界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政策，成为闻名一时的“红色教授”。1938年秋，马哲民就任朝阳学院政治系主任。工作期间，他与黄松龄、邓初民等左翼教授志同道合，在学院讲坛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反对国民党独裁反共的反动政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日本侵略必败、中国抗战必胜的深刻道理，

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也广受进步知识分子的拥戴。因此，他们被时人称为“邓、马、黄”红色教授，成为许多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指路人。

在教学中，马哲民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用实践深化对理论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哲民带队把课堂搬到社会实践中去，让青年学生亲历社会改革的巨大变化，让他们在历史的现场中体会新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享受思维的碰撞。同时，为了给学生们授好课，马哲民特别重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使农村发生巨变的大事，密切关注农村的动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马哲民立即组织了“扩大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社会教育及工农业余教育”系列活动，与“文教的业务改革与政治学习”及“工农业余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有效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方面，马哲民主张要把握好理论指导与业务钻研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55年至1956年，马哲民发表《我们应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

与科学——献给我们向科学进军的同志们》《论我国农村经济问题》三篇文章，前两篇明确提出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三篇则给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献给我们向科学进军的同志们》一文中，马哲民指出：“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及其与科学研究的关系的一些体会”就是“特别着重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根据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树立工人阶级革命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科学方法是“站在学科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以明确其革命性、战斗性与科学性之统一的关系”，并以此“提供科学进军的同志们参考”。

